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
DBLXSQWXGJXSYTHLWJ

国际
学术
研讨
会
论文集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论东北沦陷时期小说

..... 张毓茂 阎志宏 (1)

昨日的黄花 “囚徒”的悲歌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再认识

..... 金训敏 (27)

文学的沦陷与沦陷的文学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几个显著特点

..... 李春燕 (41)

东北沦陷期乡土文学与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之比较

..... 逢增玉 (63)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篇章

——简述东北沦陷时期左翼文学活动

..... 刘慧娟 徐漾 (75)	
是汉奸文学还是抗日文学..... 冯为群 (91)	
“五四”运动与东北沦陷区文学..... 董兴泉 (107)	
关于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的争论..... 秋 莹 (120)	
东北日本文人是否参与过“乡土文学”争论	
..... [日]冈田英树 (133)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	
..... [美]沙洵泽 孙凯 (139)	
苦难与文学	
——东北沦陷区文学的一个角度	
..... 王成国 姚楠 (148)	
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展开	
——从“文话会”到“艺文联盟”	
..... [日]冈田英树 (156)	
日伪时期的文化统治政策	解学诗 (182)
对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 徐迺翔 (199)	
试论艺文志派的创作..... 黄万华 (208)	
《绿色的谷》与乡土文学..... 孙中田 (224)	
山丁乡土文学的主张及其实践	
——兼谈《绿色的谷》的评价	徐 塞 (236)
多彩的乡土画卷与爱国者的呐喊	
——论梁山丁的小说创作..... 李树权 (250)	
女性文学的骄傲	

——评《长夜萤火》的思想艺术成就 ……王建中 (263)

评《跋涉》中萧军的六篇小说 …… 卢 湘 (281)

东北沦陷区文学作品三论 …… 高 翔 (291)

绽开在地狱层的花朵

——王秋萤和他的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
…………… 刘树声 (306)

为女人而作哀伤之歌

——试论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吴瑛的小说创作
…………… 尹铁芬 (316)

五彩缤纷的女性世界与少儿世界

——评女作家罗麦的《罗麦诗文集》
…………… 王建中 李树权 (325)

探索心灵的前哨

——谈《风雪》 …… 郎享伯 (341)

穆儒丐的精神历程 …… [日]村田裕子 (347)

我与东北的乡土文学 …… 梁山丁 (360)

爱国作家李季风 …… 铁 汉 (382)

沧海中的一滴逆流水

——青榆和他东北沦陷时期的创作
…………… 张雨门 (391)

评介《中国文艺》的两篇文章 …… 沙金成 (396)

1942至1945年东北文艺界一窥
…………… 李柯炬 朱 媛 (405)

东北沦陷期文学之我见.....	田 琳 (410)
一个岔曲.....	梅 娘 (414)
我们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活动.....	刘丹华 (417)
编后记.....	(427)

论东北沦陷时期小说

□张毓茂 阎志宏

近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全面系统地把握现代文学整体性发展规律的需要，使过去的许多学术禁区得以突破。有待开拓的学术领域——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些有识之士不畏艰难做了大量填补这块学术空白的基础工作。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已逐步从一般性的资料搜集转向系统的具体的研究。但要使这一时期文学的状貌、性质、内涵特色更加分明清晰起来，还有许多艰巨细致的工作要做。本文选取东北沦陷时期的小说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力求在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小说的历史原貌，阐明其与中原文化、外来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承传轨迹，及其思

想倾向和审美特色,探索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本质和规律。

东北新文学的进程与小说发展轨迹

东北新文学虽起步较晚,但在“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下也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从1921年开始,沈阳、吉林、哈尔滨等地都开始有了新文化运动,一些报刊陆续刊载国内新文学作品,给尚处于蒙昧状态的东北文坛带来了生机。1923年以后,相继出现一些比较进步的文学社团,如吉林的穆木天、刘政同等人组织“白杨社”,出版《白杨》杂志,沈阳的梅佛光等人组织“启明学会”,出版《启明旬刊》杂志,成为“东北文坛新文学运动第一次具体的表现。”^①他们着重新思潮的提倡,反抗封建旧势力,实际带有“启蒙运动”的性质。二十年代末东北新文学出现了繁荣局面,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指导下,在国内左翼文学的推动下,东北兴起了“普罗文学”、“民族爱国文学”两种文学思潮或主张,《关外》、《北国》、《辽风》等刊物努力宣传革命文学理论和主张,启发人民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并以积极的创作给后来沦陷时期的文学作者以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在报纸的副刊上出现了白话小说创作,多是描写小资产阶级个人苦闷,婚姻不幸,抗议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对现代青年的束缚压抑,宣扬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总的看来内容浅薄、幼稚,技巧上多模仿国内新文学作家,但对东北新文学来讲,毕竟有开拓意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伴随着民族灾难,本应正常健康发展下去的东北新文学却以异常扭曲和复杂的面貌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程中。在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文化统

治下，东北新文学在极端险恶的境地中顽强挣扎，从依赖于报纸的副刊逐渐走向专门的文艺刊物。围绕“描写现实”、“暴露黑暗”这一问题，形成了沦陷时期两大创作主力的“文选”、“文丛”派和“艺文志”派，引发了“写与印”、“乡土文学”、“没有方向的方向”等文坛论争。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东北沦陷时期的作者们异常艰难地从中外文学汲取营养，发展自己。特殊的殖民地生活和社会条件、特殊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特殊的地域文化和创作主体心态决定了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文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日本当局拼命鼓吹和扶植封建法西斯文学、粉饰文学，但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无产阶级文学、小资产阶级爱国抗日文学始终存在着、斗争着、发展着。即以小说作者论，有人不惜牺牲生命从事抗日爱国文学活动；有人一直坚持民族立场执着于现实人生；有人前期写过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后期却写过坏的或反动的作品；有人逃避现实，走向虚构幻想世界；有人苛且偷生为敌人歌功颂德，但死心踏地做汉奸的民族败类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作者的隐晦曲折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展现了沦陷区生活的各个层面，绘出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心理情绪，进步的、爱国抗日文学在与取媚于日伪统治者的粉饰文学、迎合小市民口味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较量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成为民族“清醒意识”（罗曼·罗兰语）的持有者。这一时期的文学，大致经历了沉寂、中兴、衰落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沉寂期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统治下，东北新文学进入了沉寂世界，但并未成为一片空白。沦陷初期在日伪统治比较薄弱的哈

尔滨，形成了以中共党员和爱国作家为主体的进步作者群。他们受俄苏文学和“五四”以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普罗文学影响，创作了许多抗日文学作品和暴露现实的进步作品，为沦陷区文学树立了正视现实、暴露黑暗的传统。萧军、萧红的《跋涉》代表了此期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沦陷时期作者效仿的榜样。在敌人统治较严的辽南地区，寻求精神出路的作者们只能以文会友抒发苦闷。在众多的社团中真正有些创作成就的是标榜追求纯艺术的冷雾社、新社、白光社和贴近现实的飘零社。他们曾就文坛建设等问题展开过论争。此期的小说创作，整体上并不景气。哈尔滨进步作者群以他们鲜明的、新鲜的创作震撼了沦陷区文坛，但1934年，这个作者群的骨干人员南下上海后，东北小说界的力作并未出现，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东北劳苦大众的不幸命运，但对现实的描写多处于表面层次，小说艺术表现力较弱，视野不够开阔。多数作者还未掌握表现这种低气压下的生活技巧和恰当途径。

第二阶段中兴期，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颁布。

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已把东北变成了它大举侵略中国内地的军事基地，其思想文化统治较之沦陷初期更加严密、系统，专门成立弘报处，控制新闻舆论、文艺出版，加强法西斯文化统治。1941年3月颁布的《艺文指导要纲》强化了对文艺的殖民统治，强调以所谓“八纮一字”的“建国精神”作文艺目标，明确规定不许写黑暗面，严禁流露悲观失望情绪。但是，东北新文学并未在“沉默中死亡”。沦陷区的作者们通过各种渠道借鉴关内新文学和外国文学，艺术表现力不断加强，隐晦

曲折地暴露黑暗、渴望光明。特别是小说发展较快，他们已不满足于截取片断生活的短篇小说，而积极致力于长篇创作，力图宏观地再现东北历史沿革、变迁和殖民地社会生活及民众心理的复杂性。这一时期，形成了三个以各自刊物或丛书为中心的文学社团：艺文志事务会、文丛刊行会和文选刊行会。在理论主张和审美意识上，前者提倡“写印主义”、“没有方向的方向”，有逃避现实、追求纯艺术倾向。其主要成员有：古丁、小松、爵青、疑迟、辛嘉、外文等，创办有《明明》、《艺文志》文学杂志。该会1941年3月解体，其成员变化较大。后两者文学主张较一致，强调文学应“描写真实”、“暴露真实”，成为“教养群众的利器，认识现实的工具”。其主要成员有：山丁、吴郎、吴瑛、梅娘、金音、秋萤、陈因、袁犀等人。这一派多数人是山丁提倡的“乡土文艺”的实践者。到1940年前后，东北沦陷区文学进入到繁盛阶段，小说成为佼佼者。以上所举作者几乎都有了相当的定评，并确立了文坛地位。此期的小说创作，由短篇进入中、长篇，数量增多，质量增强，许多小说专集出版，如山丁的《山风》，吴瑛的《两极》、梅娘的《第二代》、秋萤的《小工车》、袁犀的《泥沼》、古丁的《原野》、爵青的《欧阳家的人们》、小松的《野葡萄》、疑迟的《天云集》等等。作家们基本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描绘，进入到对整个沦陷区社会深层结构的刻画，不同地域文化造就的文明形态及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特异性，以及封建家族制度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突变中的崩溃，都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在文学体式自身发展方向上与同时期的注重史诗性的关内新文学创作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第三阶段衰落期，从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颁布到1945

年日本投降。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日益增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在文学上大肆鼓吹“决战文学”，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强化作品审查，甚至如山丁已印好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也被撕页才准出版。文学被侵略者纳入战争轨道，已没什么真正的文艺可言。

沦陷时期小说内容总趋势

——国难乡愁的写真

(一) 沦陷初期北满抗争文学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社会，受欺侮，遭践踏。特殊的殖民地生活和社会条件必然在作家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并投影于其作品中。站在世代生息的土地上却不能自由地呼吸祖国的空气，亡国奴的悲哀使沦陷区的新文学作者无论是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识都极力葆有那一丝不能割断的民族血脉，民族主义的抵抗情绪深深隐藏在对现实的客观描绘中。沦陷初期，在日伪统治比较薄弱，而又受俄苏文化影响的哈尔滨形成了一个进步的作者群。萧军（三郎）、萧红（悄吟）、罗烽（洛虹）、舒群（黑人）、金剑啸（巴来）、李文光（星）、白朗（刘莉）、邓立（山丁）等一批党和非党进步作家，以长春《大同报·夜哨》副刊和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为阵地，以鲜明的抗争色彩，为沦陷区版图变色、国土沦丧、人民苦难的历史突变绘出国难乡愁的写真图，最早发出了不愿做奴隶的愤怒吼声。

在文学观念上,哈尔滨作者群将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置于首位,着眼于描写现实,反映下层社会苦难和不幸,把文艺作为“人类最底层的呼声”,“人生的现示,发掘和创造”^②,认为东北文艺必须“先从暴露乡土现实作起”^③,文学者不能只埋首书斋,还要和“现实亲吻一下”^④,他们看重文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日本帝国主义极力鼓吹复古读经,向东北人民灌输奴化思想的现实背景下,萧军等人“暴露乡土现实”的主张是对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五四”“为人生”的新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所谓的乡土不只是二十年代鲁迅倡导的“乡土文学”中的乡土,而具有更深广的现实内容和民族内涵,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广泛描绘在日伪统治下艰难渡日的各阶层心理成为哈尔滨作者群的共同追求。萧军、萧红合著的第一部小说集《跋涉》,把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对生的奋斗与死的挣扎,鲜明地展示给读者,使人看到“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并给人们一条“出路的线索”——反抗。这里有为贫穷所困扰的青年知识分子群像(《桃色的线》、《烛心》、《孤雏》、《广告副手》),有衰弱的老人为糊口沿街在寒风中挣扎(《这是常有的事》),有被地主活活烧死的长工(《王阿嫂的死》),也有不甘忍受地主欺榨而觉醒,加入义勇军行列的长青母子(《夜风》),从事抗日活动的刘成(《看风筝》)。在艺术表现上,萧军既有浪漫主义的韵味,又融入左翼文学成分,着力歌颂反抗意志,注重从具体对象上开掘其美学意义。而萧红则以散文化的抒情笔调¹¹⁶,侧重内在情感的表现,虽说这些作品与他们后来的作品相比还显得稚拙,但确实给沦陷初期荒凉沉寂的东北新文学以一线曙光,受到广大

读者的喜爱。

十分难得的是，哈尔滨作者群不仅写东北的民风习俗，并掘深层文化积淀，更写出了东北人民不屈的民族之魂，在浓郁的关东乡土背景下让人感受到充满生命力的搏斗，在看似陌生的地域色彩里引发紧张激烈的战争气息。李文光以“星”的笔名发表的中篇小说《路》，在广茫的东北荒原上展开雄浑的抗日场面，在茂密的青纱帐里，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充满原始野性的武装起来的农民——曾经是土匪的一群人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歌声中，开始和敌人交上了火。小说运用了鲜明的东北地方语言和土匪暗语，给人以新奇感和强烈的吸引力。这篇小说与端木蕻良1937年写的短篇小说《遥远的风砂》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比之更有现实战斗性和生活气息，可以说它是描写抗日义勇军生活的较早小说之一。

哈尔滨作者群所开创的描写乡土现实，关注普通人生活，发掘蕴藏于人民身上的反抗火种的现实主义文学之路，在广大沦陷区文学青年心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人们生活悲剧的描绘，通过暴露黑暗和暗中含有反抗色彩的艺术选择，隐晦曲折地在反封建内容中渗透反帝爱国思想，表现爱国抗日的主题，为沦陷区文学树立了直面现实，反抗奴役的传统。虽然在1934年后，这一作者群的骨干作家南下上海，躲避日伪迫害，但他们的创作影响并未因此消失，时间愈久，愈见其指引前行的光芒。

（二）沦陷时期小说基本内容：生活悲剧的写真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觉

醒、大奋起的产物，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影响的产物，烙印着“改造民族灵魂”的痕迹。鲁迅在为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葛琴的小说《总退却》作序时谈及了现代小说在题材与作品主角上与古代小说的不同。他说：“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小说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到了三十年代，文学又发生了“分明的蜕变”，“并非英雄”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士兵成为文学的主人公。东北沦陷时期的小说在题材和人物表现上，大体与鲁迅指出三十年代文学总趋势保持了一致，但又有其特殊性，即由东北殖民地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暗”的描述和“明”的希求，使人在不自然的情节和人物形象中感受到生活于殖民地社会里人们深刻的苦恼。当然，受作者自身条件和客观现实的限制，大多数创作没能达到鲁迅所称道的“显示着灵魂的深”，因而“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的“在高度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但那些具有民族意识和艺术良心的沦陷区作家，感受着殖民地社会苦难的生活，以自己的创作写出了一幕幕人生和社会悲剧，表明了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被奴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描写社会黑暗成为绝大多数作品的主要内容。“描写真实”成为多数作家追求的目标，其中文选、文丛派的山丁、秋萤、袁犀、梅娘、吴瑛和其他流派的疑迟、田瑯、石军等人在描绘社会实况和沦陷区人民精神心态方面有较持久的努力。即使那些想在超现实的唯美主义中寻求安慰的作家，如“艺文志”派的古丁、小松、爵青等人，虽主张对现实黑暗作冷静的审美欣赏，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现实，但其作品

也无不是现实生活的折射。

纵观沦陷时期小说创作，在以下几方面多有共同之处：

首先，围绕知识分子在民族灾难面前的生活态度、人生信念、价值取向的变化构思和确定主题，塑造了一些“多余人”的形象。

沦陷初期“四大社团”之一飘零社的发起人秋萤是文选派重要作家，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不再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反封建要求的简单重复，在继承“五四”前辈工作的同时，更把殖民地社会中倍受民族苦难折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迹变展现出来，描绘了“九·一八”前后东北青年的奋起与堕落、追求与迷惘的心理变化，将不甘堕落又找不到出路、既不甘放弃民族生命精神，又为环境和生活逼迫不得不随波逐流的那份凄苦之情真切地表现出来。《去故集》、《小工车》中的许多作品，如《暮景》、《春雨》、《离散》、《丧逝》、《三秋草》等篇中不同程度揉进作者个人凄苦的人生体验，剖析了罗亭式“多余人”的矛盾心态。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林梦吉由一个纯朴的上进青年蜕变成颓废的“多余人”的变化，隐含了作者在乡邦沦陷之际的孤独焦虑和难言的悲怆，以此现实的描写，希望东北青年“能在无路的颠仆里，一同寻到明显坦荡的历史大路！”^⑥因此，秋萤虽对林梦吉式的“多余人”表示同情，又希望他们战胜软弱病。秋萤还塑造了与“多余人”相对的爱国的抗日知识分子形象，《嫩芽》中的萧维扬、《书的故事》中的林先生和他妻子梅玲，都是不顾个人利害得失为大众事业奔忙的人，他们沉着、镇定，信仰坚贞，与苦闷的时代抗争，乐观地生活和斗争。作者塑造这样的形象时虽多是侧面渲染，但仍

使人看到了形象的清晰品性，让人领悟到作者在他们身上所寄托的东北青年的真正出路和民族复兴的希望。

如果说秋萤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多是借鉴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那么山丁则对托尔斯泰和有岛武郎的仁爱思想更感兴趣，并将它融入到自己的人物中。《银子的故事》和长篇小说《绿色的谷》都贯穿着对人类的爱以及追求理想生活而不得所产生的人生虚无感。前者的主人公是模糊的有这种理想，而后者中的主人公少东家小虎则把它变成了现实，这个人物与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端木蕻良《科尔沁草原》中的丁宁以及作家有岛武郎都有着血脉联系，作者赋予他以理想主义色彩，让他把土地分给佃户得到灵魂的解脱。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加深的情况下，山丁创作上与日本“白桦派”相近的人道主义因素并不能真正有助于他探索理想的人性。与那些含辛茹苦，忍辱负重而又艰难求生的劳苦大众相比，小彪式的知识分子的追求是那样微不足道，摆在作家面前的已不是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和怎样的社会才有助于个性成长的问题，而是在毫无人身和思想自由的殖民地社会怎样生存下去的问题，因此山丁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他所倡导的“乡土文艺”中更实际的社会底层人群，表现了作家与残酷的现实社会进行搏斗、顽强抗争的勇气。

二是塑造沦陷区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艺文志”派作家更侧重描绘有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所谓“失了味的盐”的苦闷、彷徨、堕落的心灵历程，这些都市文明的畸形儿在奢侈的生活中无法摆脱“精神饥饿”，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在时代大潮冲击下终会被淘汰一群。曾以“冲破大寂寞，驰骋大荒原”的呼喊走上沦陷时期文坛的古丁在他的第一

部小说集《奋飞》中比较多地描绘了生活在殖民地社会，承受着中西文化和价值观念冲突的知识分子形象，受鲁迅和果戈理讽刺和幽默艺术方法影响，古丁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了喜剧的表现形式，《吉生》中的只能把理想埋在心里不敢付诸行动的吉生，《莫里》中曾是反封建勇士而后屈服于黑暗社会势力的莫里，《皮箱》中被封建伦理道德吞噬的小妹，《原野》中自以为学贯中西，实际是文化贫血儿的钱经邦等形象都有很强的现实性，是作者生活圈中常见的。古丁以其初入文坛抨击时弊的杂文之风，比较严肃地正视他们乏味的生活和人生态度，正如作者自谓，“没有有心陪笑或有意帮腔，”^⑥目的是在于激起这些人反省自新。1938年后古丁渐渐失去激进的战斗姿态，创作走上“官准立案”之途，一味讲求幽默和谐，实际已落入不关痛痒的“油腔滑调”之中，曾获1939年第二届“民生部大臣文学赏”的长篇小说《平砂》即属此类。

“艺文志”派中以文辞华美著称的小松较多受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他多选择资产阶级家庭中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长篇小说《无花的蔷薇》以“九·一八”事变为背景，写了一群醉生梦死、游戏人生的资产阶级儿女随逃难的人群无目的地漂流到南方，仍是吃喝玩乐，在混不下去时又回到东北，却只见荒芜的家园了。小说本可以动态地描绘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但作者将富有才情的笔过多用在青年男女的感情游戏上，并未写出生活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在长篇《北归》和中篇《蒲公英》中，小松试图在广阔的时空中反思沦陷区的生活，但他表现的生活于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既蔑视庸俗的市民习气，又没有勇气战胜自身“软骨”病，知识成了他们的负担或走入歧途的敲门砖。由于作者以审美的姿态冷眼人生，侧重于语言